

生命政治·自我关怀·伦理美学

——赫勒对福柯思想的批判性吸收

刘 灿

(四川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 成都 610207)

摘 要: 米歇尔·福柯与阿格妮丝·赫勒同为 20 世纪下半叶重要的哲学家,前者曾对后者的理论转型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具体呈现于生命政治与伦理美学两大问题维度。福柯后期思想有着明显的伦理转向,他将自我关怀列入应对现代性危机的处方中,并创造性地引入了“生存美学”这一概念,据此生成了一种带有美学形态的自我伦理学。赫勒将生命政治与伦理问题关联思考,尤其重视福柯的自我关怀理论。她提出了一种注重个体自主选择的个性伦理学,强调情感操持这一主体对自身的感性实践,指认美是伦理的固有内容而非装饰。从福柯的生存美学到赫勒的个性-伦理美学,二者皆将目光聚焦在伦理主体的感性生成方式上,为重建伦理主体提供了一条重要的审美路径,也为当代伦理学与美学的双向互动提供了一种新范式的转换契机,共同推动了当代美学的伦理转向。

关键词: 福柯;赫勒;生命政治;自我关怀;伦理美学

中图分类号: B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94X(2025)03-0024-09

米歇尔·福柯作为 20 世纪西方社会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对当代人文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美学领域也做出了突出的理论贡献。福柯后期思想有着明显的伦理转向,他将“自我关怀”(self-care)列入应对现代性危机的处方中,并创造性地引入了“生存美学”这一概念,据此生成了一种带有美学形态的自我伦理学,丰富了当代伦理美学的理论体系。回顾东欧哲学家阿格妮丝·赫勒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的理论转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其思

想演进中福柯的身影。赫勒对福柯思想的批判性吸收,大致呈现出生命政治、自我关怀和生存美学等问题维度,她进一步将生命政治与伦理问题、美学问题关联思考,丰富了伦理美学的理论内涵。今年是福柯逝世 41 周年,论文以同时代哲学家阿格妮丝·赫勒为参照,感受 20 世纪福柯的理论魅力以及他在重建伦理主体问题上所引发的思想激荡,而厘析赫勒对福柯相关理论、思想或范畴的继承与发展,对于梳理赫勒伦理美学的生成脉络也十分重要。

作者简介: 刘 灿,四川大学助理研究员,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出版项目(24FYZ060);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2JZD005)

一、生命政治与伦理问题

20 世纪 70 年代,赫勒开始关注福柯、德里达、卡斯托里亚迪斯等战后法国哲学思想,尤其看重福柯对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的批判,这直接推动着赫勒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转型。赫勒坦言,在与福柯见面之前就已经在大学里讲授过福柯。进入 80 年代,赫勒开始大量阅读福柯的作品。1986 年,赫勒前往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就职,她逐渐意识到福柯生命政治概念以及阐释这一概念的重要性,然而福柯于 1984 年病逝,两人未能进行进一步交流。纽约时期的赫勒积极地参与全球性议题的讨论,频繁地与哈贝马斯、鲍曼等学者对话,其理论视野更具世界性和当代性。赫勒曾明确表达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传统马克思主义已经难以解释新的现实问题,由此吸纳了福柯的思想来解释全球化的社会和文化形态。^[1]在赫勒看来,福柯是一个“杂食性诠释者”(omnivorous hermeneut)^{[2]117},他谈论的主题包括但不限于知识、权力、伦理等,人们可以从其思想中找到各类传统哲学主题,而它们又蕴含了诸多新问题。福柯从来不提出“什么是真理”等相关问题,而是追问“真理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他将真理或知识与权力关联起来并考察权力的微观层面。90 年代伊始,赫勒聚焦于性别、种族、环境等具体问题,发展了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然而随着对福柯思想理解的深入,赫勒观察到福柯从权力谱系学转向对伦理谱系学的思考,她对福柯的伦理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尤其是在自我关怀/自我治理等问题上,她关注到其中的审美维度并对此做出了重要的回应。

生命政治理论可以说是赫勒对福柯思想最直接的吸收,也是最能直观显见福柯对赫勒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型的影响。赫勒与费赫尔于 1994 年与 1996 年分别出版的关于生命政治理论方面的著作,^①开始启用福柯生命政治理论相关的概念。生命政治作为西方政治哲

学的新概念,也是福柯后期哲学思想的重要主题。生命政治学的提出标志着传统政治秩序被打破,人的生命“进入了权力和知识的秩序,进入了政治技术领域”。福柯认为,生命政治学与人口有关。他试图揭示作用在人口-生命及其生物性层面上的治理技艺。赫勒观察到,福柯所言的生命政治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它改变了政治的概念。现代治理将个体生命纳入国家治理形式中,在身体乃至人的情感、需要的政治化中,人的生物性被纳入生命权力技术的运行机制。正如赫勒所言,生物学背后存在着一种种姓观念、一种阶级观念,它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除了直接继承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赫勒还深受阿伦特的影响,她提到“如果要对生命政治议程进行认识,需要重读《人的境况》”^{[3]7}。在阿伦特政治哲学基础上,赫勒进一步指认日常生活是生命政治的起点,大众文化政治是生命政治的表现形态。在对生命政治主导下的各类社会运动的观测中,赫勒对作用在人的需要、日常生活等感性场域的微观权力进行了批判,她发现极权主义的毒液从公共领域渗透到私人领域,透露出生命政治在感性领域的运作形式。除此之外,赫勒转向生命政治理论还有一些现实因素:她以生命政治解读其东欧政治经历,发现当局对个体感性需要的分配和干预,乃至西方国家加诸于东欧社会的政治正确,皆显现出一种生命政治形态。

赫勒非常看重福柯《规训与惩罚》这一作品,她不止在一个文本中引用福柯这本书中关于“身体”的观点。赫勒反思身体或具身性问题在西方哲学传统中的理论演进,她评价福柯“灵魂是身体的囚笼”等观念是对西方强调灵魂/精神形而上传统的翻转。在论及身体与灵魂的二元关系时,赫勒指出福柯将身体从灵魂的监狱中解放出来,丢掉了形而上学的包袱,她发现了禁锢身体的理性逻辑。赫勒在福柯身体/知识-权力谱系学的基础上继续思考现代性问题,她用福柯式的话语哀叹,“现代社会几乎所有的主要动态趋势都与身体背道而驰,

它们低估和压制身体,并试图约束和取代身体”^{[3]14},这透露了赫勒对现代人身体所呈现的人类境况的深深不安。福柯与赫勒都受到尼采哲学的影响,着眼于对理性主义哲学的批判。福柯以“理性批判者”著称,他考察西方社会长期以来理性对非理性(疯癫)的禁锢、压制和排斥,通过对西方理性时代疯癫史的梳理,揭露理性精神残酷暴虐的一面。理性主义遭受的责难尤其体现于它对人身体的俘虏和压抑,赫勒总结出战后法国哲学对理性主义的四种典型指责:(1)理性囚禁了身体;(2)理性主义的繁殖注定了身体会罹患疾病;(3)理性使得身体成为它的俘虏并歧视那些“不正常的人”; (4)理性偏好抽象的概括并将身体归纳为一般物质,消解了身体的独异性。^{[4]51-52} 这些对理性不同的指责,事实上展演着理性主义对身体控制与压抑的不同方式,与此同时,理性主义对身体压迫的同时还生出一系列的道德(伦理)原则,比如维持身体健康、尊重欲望的自由多元化、尊重身体的差异性等,正如身体对理性精神的依赖,理性同样长出肉身,身体的政治化或伦理化成为现代性不可避免的结果。

面对“解放身体”这一启蒙现代性的虚假承诺,福柯与赫勒二人有着共同的忧虑,但二者关注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福柯对西方社会身体谱系学进行细致勾勒,他发现从文艺复兴时期到古典时代再到现代社会,理性对人的肉身加以控制、压抑、异化,为人们呈现了一部细节完整的理性时代的疯癫史。赫勒接续了福柯对西方启蒙理性的批判,她在现代性视域下展开对生命政治的反思,细致地考察了西方社会政治运动中关于“解放身体”的诉求。赫勒在自由与生命这两个现代性争端中重新定位身体,但她坦言,自由是一种精神性自我建构的价值,而且这种价值不能以身体为基础,所以人们不再对灵魂与身体的融合抱有期望,现代人永远不会放弃这种价值。在赫勒的生命政治理论中,她以人的身体为问题视点,通过观察权力技艺如何作用于人的身体(肉体),指认“生命政治是一种身体政治”。赫勒认为

自由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然而“工具性的自由与自由的本质相去甚远,这引发了极大的争论,这场争论的具体背景是现代性时钟的摆动,它使得身体再次回到‘羊圈’(fold)中”^{[4]104}。事实上,早在《从红到绿》(*From Red to Green*) (1984) 这篇文章中,赫勒已然透视了生命政治理论的核心命题,即“自由与生命在反叛身体中艰难共存”。赫勒发现生命和自由这两种现代性价值占据了争论的中心,但不论是将自由绝对化而忽视了人的生命,还是以牺牲自由的代价强调生命,这些都是充满问题的。^[5] 生命(身体)的自由成为当代政治关注的热点,阿甘本、奈格里、埃斯波西托等学者也积极参与讨论,赫勒通过生命与自由这一对经典范畴,清晰地向人们解释生命政治的争论焦点。莱姆克评价赫勒关于生命与自由在身体维度难以调和的冲突这一发现,是对生命政治理论的独创性贡献,它直面生命政治的内在矛盾。^[6] 赫勒不仅发现了问题,还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她首先承认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冲突是无法调和的,甚至彼此之间无法进行对话,但她仍然认为人类美好生活的实现是生命与自由两种价值观得以综合的彰显。

福柯早期偏重于考察加诸于鲜活个体的权力机制,其后期思想则呈现了一个明显的伦理转向,逐渐从对生命权力的思考转向对伦理谱系学的梳理。赫勒已经注意到福柯生命政治中蕴含的伦理维度,尤其是他关于牧领权力的思考直接联结着其对自己治理和治理他者的伦理反思。事实上,较之于生命政治理论,她更关心生命伦理(bio-ethics)的问题。赫勒明确地将生命政治与伦理问题作为一个关联性问题提了出来,甚至直接以“生命政治与伦理问题”(Biopolitics and Ethical Issues)为题,分别从不同维度批判作用在身体维度的理性压抑。赫勒的生命伦理是一种关乎身体(生命)的政治伦理学,她分析生命政治中自由与生命之间的价值冲突,构建了生命政治与感性伦理的内在关联,她将人的身体/生命与更广泛的

政治治理、权力结构和伦理需要联结在一起。比如,健康或疾病的隐喻最能代表生命伦理问题,健康被当做一种道德。真正的健康是指身体从精神解放恢复到自由和道德的标志,每一种文化都把道德原则应用到健康上,这始于将伦理和美学结合在一起的希腊理想。^{[4]53}赫勒十分关心现代技术对人的改造、安乐死等所带来的一系列新的伦理问题,她认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伦理指向,即对“生命形式的多元化”(pluralism of forms of life)的捍卫。赫勒还表达了她对福柯生存美学的理解。她接受了福柯的自我关怀论,认为“只有关心,而不是身体自由与生命的对立才会促成牧羊人对现代性的生存负责任地参与”^{[4]57}。赫勒还在现代伦理问题中引入美学原则。她在分析身体的权力化的时候,已经指出了理性主义对身体的压抑,其中一个让人责难的维度便是消解了身体或欲望的差异性原则,在她看来,身体的差异性原则不是一种道德原则,而是一种美学原则。现代性反对所有针对于人类的同质化与量化,那么在美学领域也不可能存在一种普遍适用的标准。“美学是一门被忽视的学科,它提醒我们,我们的道德行为也应该有一种风格。”^{[4]57}可见,赫勒在福柯的基础上不断地拓展生命政治的理论边界,在她所预设的性别政治、健康政治、环境政治、种族政治等诸多问题情境中,生命政治不仅呈现了政治伦理的问题向度,它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美学问题。

二、自我关怀的审美向度

从萨特到福柯再到德里达和卡斯托里亚蒂斯,战后法国哲学的形成主要基于对笛卡尔理性主义的质疑,他们试图拆解先验主体的形而上结构以反对理性主义的压迫。后现代思想家们对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的批判,以及对元伦理学的反思与突破,生成了新的伦理准则。福柯后期考察一种以自我关怀为主导模式的伦理学,他逐渐将研究重心转向主体与自身的关系上来,这对赫勒生命伦理观念的形成

有着重要的影响。赫勒细致地考察了福柯以主体为核心的伦理谱系学,她关于个性伦理、情感培育等问题的思考,与福柯对自我技艺的论述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在《性经验史》、法兰西学院的讲座以及《自我的技艺》等作品中,福柯有意识地将问题对象从对“权力的技艺”转向“自我的技艺”,他试图跳出权力逻辑重新审视伦理主体,福柯推断如果真的只有在修身关系中才有抵制政治权力的首要的和终极的支点,那么建立一种自身伦理学也许是一种紧迫的、根本的和在政治上不可或缺的任务。^{[7]295}自我关怀是西方哲学的主线之一,刻在德尔菲神殿门楣上的“认识你自己”,是苏格拉底最著名的箴言之一,与此相伴相生的是“德性即知识”,它标识着苏格拉底由对自然万物的思考转向对自我内心的关注,在这个判断中,“认识你自己”便是自我关怀的一种伦理形式。福柯试图复兴“自我关怀”这一概念,他发现古希腊罗马文化曾经将修身养性等对自我的关怀看作道德实践的主要内容,这种转向自身的要素是训练、实践、培养和修行,而不是认识。因为,在古希腊罗马文化中,“认识你自己”并非抽象的理念层面的自我认识,而是在转向对自我关注的自由实践。换言之,认识自己仅仅是关心自己的一种形式、一种结果或一种应用,只有专注于自身才能够真正地认识自己。自我关怀是一个伦理问题,它首先要处理的是主体与自身之间的关系,是一项贯穿于个体生命始终的实践行为。

对古希腊人而言,自我关怀曾是所有道德理性的基本原则,到了现代社会,自我关怀的伦理性反而被忽视。在西方基督教义文化盛行之际,自我伦理曾经被“他者伦理”所遮蔽,对邻人(他者)之爱成为救赎哲学的核心要义。伦理关怀包括自我关怀和对他人的关怀,对他者的关心是传统伦理学谈论的重点,而对自我的关心却很少成为伦理学思考的对象,甚至成为了自私自利的代名词。列维纳斯反对那种过分强调主体的道德哲学,他看重对他者绝对无限的责任,强调对邻人而非对上帝的爱,他

者伦理要求对他者——对那个看着我、面对我的他者负责,生成了“无限为他者负责”的绝对命令。利奥塔、德里达等后结构主义的代表接续了列维纳斯的伦理思想,德里达试图解构伦理这类宏大叙事,但其关于友爱政治、礼物、给予等伦理议题,无一不带有“为他”的伦理导向。与列维纳斯强调的他者伦理学有所不同,福柯反对真理化的道德律令,他提供了一种主体伦理化的模式,即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存在建设成为美好的存在,这种自我伦理学中的主体既是美学的,也是伦理的。这种新的伦理呈现出个体与自我的关系,它以“自我关怀”为核心内里和表现形式。福柯试图重新恢复“自我关怀”的伦理意涵,他通过对现代人道德困境的诊断,将自我关心列入解救现代性伦理危机的处方中,并据此生成一种关怀自身的生存美学。赫勒同样关注主体性问题,尤其是自我如何保持自身个体性的问题,并以此构建了强调存在选择的个性伦理学。

福柯的自我伦理学中的主体是实践中的主体,主体在自我关怀的实践中以确保自身的完善,主体与自我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伦理关系之中。早在20世纪80年代,赫勒已经关注到福柯逝世后出版的两卷本,尤其是《美学、方法论、认识论》(*Aesthetics, Method, Epistemology*)^{[2]116},这一卷汇集了福柯对疯癫与文明、理性与非理性,特别是对伦理和权力的理解和关注。福柯对西方理性主导逻辑的形而上学进行批判,试图对意识主体或知识主体进行解构。赫勒同样挑战近代哲学规范的知识主体,她谈论的主体是实践中的自我。不同于福柯在一种解构的形式中谈论主体的抵抗,赫勒的思想虽然表现出后结构主义的方法,但她仍然从主体的视角出发去理解主体,谈论人的本能、需要、情感等问题。自我关怀将自身目的化,它关系到个体的一系列感性实践或体验自身的方式。赫勒曾指出人们在学习“我认为”或“我说”这类句子之前,他们肯定意识到了“我感觉”这句话的重要性。所以,在赫勒看来自我实践不仅是一种灵魂的实践,更是一种身体的实践,这与

福柯将身体的修炼作为一种塑造伦理主体的方式这一主张不谋而合。自我关怀既是一种内省的练习,也参与了个体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塑造,主体与自我的关系同时也是主体与他者的关系,人们在面对自我的同时,也是与他人对话的过程,因为自我关怀同时包含着关心他者、关心世界等伦理责任。现代人同时承担着自我关怀和关心他人的双重道德责任,赫勒将关心这一主体实践与道德责任联系在一起,按照她所构建的道德主体模型——好人,强调好人对他者脆弱性的关照。好人应该首先学会关心他人,学会避免对他人造成伤害。赫勒认为关心他人是伦理道德的普遍性原则,她提出了关心他人的四点具体化要求,包括真正地顾及他人的脆弱性、关心他人的自治、关心他人的主体性道德、关心他人的苦难。^[8]赫勒认为有必要更新福柯对自我关怀的理解,关注当今世界的关怀问题,即我们须讨论关怀活动在当代生活中的各种表现形式,以及我们在当代世界自主生活的可能性。

自我关怀关涉到个体及其生存和生存方式的问题,换言之,对自我的关怀是一种生活方式。正如福柯的总结,随着伊壁鸠鲁哲学和斯多葛派哲学的出现,关心自己成了每个人一生的永恒职责。^{[7]46}福柯所建构的伦理形象是以自我作为关心的对象,强调个体的自由自主地选择,自我技术、精神训练、自我完善、自我关怀等都是这种自我伦理学的表现形式。赫勒的情感理论、个性伦理和美学思想以不同的问题形式演绎了福柯所引发的“自我关怀”这一伦理议题,包括针对人感性维度的操持、自治、耕作、培育等,这些都是围绕自我所展开的伦理技艺。自我关怀是这样一种主体技艺,人们能够通过一系列对自身灵魂、情感和行为的实践,达到自己期待的一种完满状态。赫勒提出一种注重个体选择的个性伦理学,具体表现为一种以“情感操持”^②为主导形式的感性实践。赫勒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创造了情感操持的机会,人们有机会丰富自己的内心生活并表达它,按照自己的本性塑造自己独特的感

情结构,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机会是以一种异化的形式实现的。^[9]同福柯以自我关怀为逻辑的自我伦理学一样,赫勒的情感操持同样显现为一种个体与自我的伦理关系,二人都试图通过重返主体的感性生成现场来重构伦理学。从福柯以关怀自身为逻辑的自我伦理学,到赫勒以情感操持为导向的个性伦理学,二人皆将自我关怀视为一项伦理工程。情感操持作为一种重要的自我实践,它是形成伦理主体的一条重要路径。对情感的操持是个体诉诸于自己的感性实践活动,是个体对自身情感有意识的“培育”(cultivation),培育有精耕细作之意味,是一种园艺式的自我技艺。情感操持是自我关心的感性实践,显现了关怀自身的审美逻辑,在赫勒自我关怀理论生成的感性逻辑中,一种以自我关怀为核心、以情感操持为表征的伦理美学被激活。赫勒将关心与道德责任联系在一起,她的个性伦理学呈现出对他人的关照—对自我的关切—对情感的培育这三重理论演进,这是对福柯自我关怀伦理的推进。

三、重建伦理主体的审美路径

从古希腊的“自我呵护”、中世纪的自我忏悔、近代哲学的自我认识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福柯回顾了西方文化中主体与自身的关系,他将其对先验主体的反思转向对伦理主体的构建,而伦理主体的回归旨在挑战近代先验哲学规范下的意识主体。笛卡尔以降的近代哲学中的“认识自己”与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已经有了显著的区别,哲学家们对主体的关心落入真理游戏中。理性主义主导下的自我关怀其本质是认识自己、认识真理,主体问题变成了一个纯粹抽象的经院哲学问题,人的主体化变得标准化、同一化和扁平化,作为个体的、经验的、感知的人被遮掩。理性主义哲学中的主体以一种抽空了的、风干了的、晦暗不明的形态存在,是一种超验主体或知识主体。福柯所看重的是不断生成的、有血有肉

的、活生生的主体,他反对那些剥离了感性维度的主体哲学,他消解了自笛卡尔以降的先验主体或意识主体,这种消解是通过自我的伦理实践——“自我关怀”完成的,主体让自己停留在关怀自身的感性活动之中。自我关怀是主体构成自我的起点、过程和目的,人通过自我关怀的伦理实践重新获得主体性,对自我的技艺突显了主体由先验主体向伦理主体的演化,这事实上也是对主体塑造的知识—权力逻辑的抵抗。在20世纪80年代,福柯提出“生存美学”这一重要思想,旨在批判近代主体哲学对个体的“主体化”或“抽象化”,知识—权力的逻辑打造出标准化的个体生命,现代人的伦理存在消解于知识主体的形塑之中。通过重建自我关怀的伦理意涵及其实践意义,福柯在伦理主体的构建上做出了突出的思想贡献。福柯尝试在美学维度重审人的主体性,在自我的审美化或风格化中将伦理主体从知识主体中解救出来。福柯对主体哲学的解构以及对伦理主体的审美重建引发诸多讨论,阿甘本、哈多特等当代学者都曾对此做出重要评论,这一思想也深深地打动着赫勒。

从生命政治到生存美学,福柯考察了两种不同的主体,一是被驯服、被规训的身体主体,二是转向自我关切的伦理主体,这也意味着两种不同问题视点的转换。在生存美学理论中,福柯致力于恢复古希腊主体照看自身的自由,以应对他律性规范下现代人的伦理困境。福柯是从艺术哲学或者美学问题进入伦理思考的,尤其是他对个体审美性存在的反思。在他看来,道德伦理是与“与自己的关系”的关系,是一种朝向自身的伦理样态,福柯不是要建立一套新的道德标准,他希冀于人能够按照自由、自主、个体化的方式构建主体性。他谈到让他感兴趣的是这样的事实,即在我们的社会中,艺术变成了被那些被称为艺术家的专家所创作或把玩的东西,与个人或个人的生活无关。为什么不是我们的生活成为了艺术的对象?福柯指出我们必须把自我、我们的生命、自我的存在等当做艺术的主要工作来给予关

注,并且把它们视为我们应用美学价值的主要领域。^[10]福柯的生存美学本质上思考的是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它侧重于以一种自我伦理性的彰显。人作为艺术而存在,而各类生活的技艺被看作艺术实践,从而走向一种生存美学。个人的艺术实践正是自我技术的一种典范形式,换言之,审美主体是伦理主体生成的前奏。生存美学所论及的主体化是一种风格化/审美化的伦理存在,人通过实践赋予生活某种风格,将自我作为一个艺术品来创造,这种艺术风格本身是具有审美特性的,这一审美维度不能被随意地抹杀。然而,福柯明确地反对任何从美学的维度解读其伦理思想的做法,尤其是从审美和非道德意义上解读“关怀自我”或“关注自我”。所以,福柯关于“作为艺术作品的生活”的论点——常常被限定在伦理学问题域中,作为一种非规范的伦理形式引发讨论。

同福柯一样,赫勒也十分看重伊壁鸠鲁式的生活方式,认为哲学家的道德使命是按照他的哲学生活和行动。对生活的关注实质上是对自我的关注,在赫勒看来哲学就是思考如何思考、如何行动、如何生活等。康斯坦丁努(Marios Constantinou)曾引用皮耶·哈多特(Pierre Hadot)的观点来总结赫勒的道德哲学:哲学是一种生活的艺术(an art of living),而不是一个专门为哲学祭司保留的术语。^[11]这实质上也是哈多特对福柯后期回归自我哲学的提炼。赫勒关注的不是先验的、我思的主体,而是现代性进程中活生生的个体,她在现代人的偶然性中谈论个体性,每个人成为他所是,每个人都是其情感世界的中心。在赫勒的个性伦理学中,伦理生活未被简化为一个抽象化的理性规范系统,而是以具有丰富情感和需要的活生生的感性生活呈现的。个性伦理学强调个体的自我选择,但又不同于存在主义完全由个体主导的选择方式。经由对美与崇高的批判直达幸福和爱的主题,这是赫勒伦理美学对康德先验美学的重构。她的个性伦理学强调的不是某种先验的概念性规定,而是来自生活经验和道德品味,尤其是个人的道德修养及其情感的培育。个性伦理学旨在释放个体的丰

富性与独特性,她突破了康德以降以理性逻辑为主导的先验伦理结构,在爱欲(eros)之维重新关联了伦理和美学,显现了其个性伦理学的感性肌理,构建了以存在选择为意指的个性伦理学。

从自我伦理学到个性伦理学,福柯与赫勒二人都旨在回答主体与自身之间的关系问题。自我既是关心自己的人,又是关心自己的对象,既是伦理主体也是审美主体。福柯在建设自我伦理学的理论事业中将政治问题和伦理问题联系起来,同时也透露出其中的美学逻辑。在那些被称之为关心自己的实践中,既有把自身抽象化为关心的对象,又有自身以自身为目的的活动。^{[7]210}关心自己将自身目的化,它关系到个体的一系列自我实践和体验自身的生活方式。同福柯一样,自我如何被塑造成主体,也是赫勒关注的重点问题。赫勒也不断地丰富“自我理论”的伦理内涵,在她看来,“自我的理论是哲学理论”^{[12]30},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自我”是一种具身的自我,因为“作为自我的身体滋养着意义”^{[12]31}。自我并不总是自我意识,但它总是自我感知的。真正的自我存在于身体之中,她关注的是身体的、感觉的和情感自我,这一感性维度直达伦理主体的内在生命,但它并不遮蔽个体与他者、个体与社会的交互影响。自我关系同时也是与他者的关系,人们在面对自我的同时,也是与他人对话的过程。赫勒的自我理论有着存在主义伦理根基,她吸收了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等人的哲学思想,反复论及海德格尔关于“被抛”(thrownness)的偶然性,并在这种偶然性的基础上阐发出人在出生和成长的双重偶然性。赫勒试图在被抛的不确定性中寻求确定性,认为偶然性是被抛的状态,但也正是这种偶然性让个体能够进行自由的选择,而个体能够自由自主的选择是实现伦理生活的可能性条件。

在自我伦理的美学形态问题上,或者说在个体的审美生存方式问题上,福柯与赫勒皆为当代美学伦理转向做出了突出的思想贡献。福柯将人的生活看作一个艺术品,而对自身所施加的风格化技艺指向了一种生存美学。生

存美学呈现了一种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伦理旨趣,因为它试图将人的生活当作艺术作品来看待,这种伦理美学架构中关涉到生活中的伦理结构和伦理中的感性结构。由于福柯的早逝,这一问题未能充分展开。在“伦理审美化”的问题上,福柯的生存美学透露出一种泛审美化的伦理诉求,而他遭受非议也是这种形式上的“审美主义”。赫勒有意识地反对人们对“唯美主义”的狂热崇拜,虽然这种崇拜得到了许多后现代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的青睐。不同于福柯简单地将伦理与美学链接在一起,赫勒在美的感性生成中为伦理学的审美转向奠定了学理性基础,她指认美是伦理的固有内容而非装饰。根据赫勒个性伦理学的审美逻辑,“成为你所是本身就是一种审美的性质”^{[13]350},它强调一种内化于主体自身的审美实践,这已然不同于福柯将人自身看作一件艺术品这一泛美学化论述。此外,赫勒还反对将伦理审美化等同于生活审美化,她曾就“生活审美化”现象展开批判。在个性伦理学与生活审美化的关系上,指认个性伦理学在某个阶段附属于生活审美化的计划。^{[13]249}偶然性的、异质性的日常生活为美提供发源地和游乐场,但是赫勒认为那些试图通过美将生活同质化的尝试是失败的。不仅因为这是不道德的,还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如果生活的审美化需要同质化,那么美就脱离了日常生活。^[14]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赫勒批判的不是伦理的审美化,而是这种审美的资本化、形式化,因为审美异化才是对现代人伦理生活真正的威胁所在。赫勒多次强调一个观点:在异化的世界中没有必要过异化的生活,日常生活审美化使得日常生活表面附加的意义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这些审美化表征更多的是一种生活风格,而非真实的经验世界,也不是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

同福柯的自我伦理学一样,赫勒也始终是在思考主体与自身的关系维度上阐发她的个性伦理学,二人皆主张现代人应以古希腊自我关怀的伦理实践方式应对现实困境。自我伦理学与个性伦理学皆是一种非规定性的伦理

学,打破了传统理性逻辑主导的伦理学体系,为我们重审伦理主体及其感性存在提供了一种新的话语方式和哲思方向。虽然赫勒在不同维度吸收和借鉴了福柯的话语方法、核心议题和思维范式,但呈现出不同的理论面貌,尤其是在对待伦理与美学的关系上,赫勒与福柯有着明显的区分。不同于福柯略显空泛的生存美学,赫勒为伦理学的审美转向赋予了实质性的内容,如爱欲、友爱、需要等,在此基础上指认伦理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审美的生活方式。通过对人的感性存在及其存在方式的考察,赫勒发现现代人充满了异质性、多元化的日常生活和情感需要,在对现代性关于解放身体这一虚假承诺的批判中,主张恢复人之为人的感性特质。不论是福柯的生存美学还是赫勒的个性伦理美学,他们都将目光落在主体伦理化的感性机制上,呈现出一种重返主体自身的自我伦理学,为构建伦理主体提供了一条重要的审美路径,为当代伦理学与美学的双向互动提供了一种新范式的转换契机。

【注释】

- ① 1994年,赫勒和费赫尔共同完成了《生命政治》(Biopolitics)这一作品,二人发展了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他们将问题聚焦到人的身体维度,分解出性别、种族、环境、健康等议题,指认“生命政治是一种身体政治”,并将“现代性关于身体解放的失败”作为其生命政治理论的讨论起点。1996年,赫勒和费赫尔在维也纳举办了一场名为“生命政治:关于身体、种族和自然的政治”(Biopolitics: the Politics of the Body, Race and Nature)的会议,随后出版了同名会议论文集。
- ② “情感操持”是赫勒《情感理论》(A Theory of Feelings)中的独创性术语,也是赫勒伦理美学的关键范畴。赫勒将“操持”(housekeeping)、“家政”(household)与情感、感觉等感性维度关联,生成包括感觉家政(the household of feeling)、情感操持(emotional housekeeping)、情感家政(emotional households)等重要概念,旨在分析主体围绕其情感展开的主体实践,具体关涉主体如何运用、管理自己的情感,情感操持的目标是培养情感和丰富社会行动者的感性世界,

人们在此目标下以合理的方式管理情感资源。

【参考文献】

[1] 赫勒. 雅诺什的面孔:阿格妮丝·赫勒美学文选[M]. 傅其林, 选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362.

[2] HELLER A. Tragedy and Philosophy[M]. Leiden, The Netherlands: Brill, 2021.

[3] HELLER A, RIEKMANN S P. Biopolitics: the politics of the body, race and nature[M]. Aldershot: Avebury, 1996.

[4] FÉHÉR, FERENC, HELLER A. Biopolitics[M]. Aldershot: Avebury, 1994.

[5] FÉHÉR, FERENC, HELLER A. From red to green[J]. Telos: Critical Theory of the Contemporary, 1984(59):35-44.

[6] LEMKE T. Biopolitics: an advanced introduction[M]. TRUMP E F, trans. 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1:81.

[7] 福柯. 主体解释学[M]. 余碧平, 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8] HELLER A. A Philosophy of moral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0:41-48.

[9] HELLER A. A theory of feelings[M].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9:185.

[10] 福柯. 福柯文选 Ⅲ:自我技术[M]. 汪民安, 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174.

[11] CONSTANTINOU M. Agnes heller's ecce homo: a neomodern vision of moral anthropology[J]. Thesis Eleven, 1999, 59(1):29-52.

[12] 赫勒. 一般伦理学[M]. 孔明安, 译.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5.

[13] 赫勒. 个性伦理学[M]. 赵司空, 译.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14] 赫勒. 美学与现代性:阿格妮丝·赫勒论文选[M]. 傅其林, 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43.

[责任编辑 吴震华]

Biopolitics, Self-care and Ethical Aesthetics: Three Problematic Dimensions of Heller's Critical Absorption of Foucault

LIU Can

(College of Marx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207, China)

Abstract: Michel Foucault and Agnes Heller were both prominent philosopher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former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latter's theoretical transformation, specifically presented in the dimensions of biopolitics and ethical aesthetics. Foucault's later thought exhibited a clear ethical turn. He included self-care in the prescription for addressing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and creatively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 "existential aesthetics," thereby generating an aesthetics-infused self-ethics. Heller associated biopolitics with ethical issues, placing particular emphasis on Foucault's self-care theory. She proposed a personal ethics that focused on individual autonomous choice, emphasized the subject's sensual practice of emotional management, and identified beauty as the inherent content of ethics rather than mere decoration. From Foucault's existential aesthetics to Heller's personal-ethical aesthetics, both focused on the sensuous modes of ethical subjectivity, providing an important aesthetic path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ethical subjects. They also offered a new opportunity for paradigmatic transformation in the bidirectional interaction between contemporary ethics and aesthetics, jointly advancing the ethical turn in contemporary aesthetics.

Key words: Foucault; Heller; biopolitics; self-care; Ethical Aesthetics